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明代澳门史论稿(上卷)

汤开建〇著



06  
二編·海疆卷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K296.59

11

1

KD00967606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RY

# 明代澳门史论稿

(上卷)

汤开建 著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KD00967606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序 言

边疆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就地域层面而言，是指国家毗连边界线、与内地（内陆、内海）相对而言的区域。一般而言，历史上中国的边疆是在秦统一中原、其重心部分形成之后确立的，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相应地，中国的边疆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并与国家和边疆的安危息息相关。

从近代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过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国家边界沿革的考订、边疆民族发展的著述等，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标志。在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一些朝廷的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近代国际法的领土主权原则，与蚕食我国领土的列强势力相对抗。黄遵宪、曾纪泽等都曾以“万国公法”为武器，在处置国家边界事务中与英、俄列强执理交涉。在边疆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将政治学、法学等与传统的史学、地理学等相互结合，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

第二次研究高潮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在国家与民族危机激发下出现的又一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国际法与政治学方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之中，边政学的创立与研究、以现代学术新视角和新方法对中国边疆进行的全方位研

究，是这次高潮的突出成就；研究内容也从边疆领土主权、历史地理扩展到民族、语言、移民、中外交通等领域。与此同时，边疆考察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愈益受到重视。

两次研究高潮的实践与成果，实现了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中国史学研究向现代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转变，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兴未艾。继而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带来边疆学研究的三度兴起。此次研究高潮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盛于90年代，至今热度不减。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成立，这既是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三度热潮的产物，也进而成为国家边疆研究的前沿引领者。

近30年来，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很多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白，而且以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特点，成为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的优秀作品，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对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已形成了从最初以中国近现代边界研究为主，发展到以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近年，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遗产的基础上，已逐步形成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而为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模式。

边疆中心所实施的应用研究，是以当代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现状为切入点，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紧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追寻边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轨迹，还应探求边疆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当代我国边疆现状研究首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我国边疆区域的发展现实，促使中国边

疆现状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新的学科定位：即将中国边疆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现状与历史不可分，现状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历史的现状，所以要进一步加强历史的和现状的综合性一体研究。通过对学科布局的适时调整，中国的边疆研究不断取得学科突破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进而尽快实现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过渡。

短期内，我国在中国边疆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必须明确主旨，并应该有大的突破。在深化实证研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理论研究投入的力度，不断探索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发展的规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为历史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和变迁构筑理论体系，是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近30年来，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为中国边疆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未来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边疆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要理论层面的支撑。在中国古代历史疆域理论、历代边疆治理理论，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的发展规律、古代边疆民族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以及在近现代陆疆、海疆与边界的理论问题等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构建我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需要尽快完成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包括边疆学学科的概念、界定与范畴，学科性质和功能，学科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数所大学以开设边疆学博士点为契机，也在加紧边疆史地学科的构建；一些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先后以“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学科定位建立了相关的学科专业；围绕边疆研究先后出

现的相关学科命名有边疆政治学（边政学）、边疆史地学（边史学）、边防学、边疆安全学（边安学）等。但从学科层面看，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缺乏基本学科框架的规范系统论证。在诸如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及整体构建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研究；在疆域理论研究方面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尽快拿出较为成熟的成果。同时，应注重学科理论建设与方法论的进一步开拓，在原有的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等为主的基础上，扩展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理论与方法，进一步突出边疆研究作为跨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特点与优势，不断加快学科建设步伐。

学术研究与研究成果的出版是并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当组建不久的边疆中心在成果出版方面寻找出路的时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伸出了合作之手。一晃至今，双方精诚合作了20多年。先是以《边疆史地丛书》的形式，自1991年3月开始出版，截至2011年，先后有70余种边疆研究著（译）作面世。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持续有力地推动着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不断发展。如果说边疆中心在边疆研究方面成为了学术前沿的引领者，那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以边疆研究成果的出版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出版社。

在当前我国边疆研究氛围持续高涨的形势下，经边疆中心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共同努力，将以更为严格的科学态度、更为严谨的学风文风，共同出版水平更高的边疆研究著作。双方遂决定以《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的形式，由边疆中心组稿审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由《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近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校及解题》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两部分组成。前者共选出近50种近代以来

面世的我国边疆研究学术著述，在实施点校的基础上，作出导读性与研究性的解题，予以重新出版；后者选择近50种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边疆研究的老一代知名学者、中年有为学者、年轻后起学者的著述，汇集出版。可以说，这些著作基本代表了目前我国边疆学研究的水平。

同时，对1949年后有较大影响的边疆研究著述又进行了修订出版，特别是将新近的研究成果充实其中，使这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内容更加翔实、完整，更具学术价值。

今天，中国边疆研究已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显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尚属开创之举，一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批评指正。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在目前《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二编近100部著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努力开拓进取，组织更多边疆研究的优秀成果，继续出版三编、四编……为我国边疆研究的持续兴盛，为繁荣边疆的历史文化，为今天我国边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库》系国家出版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办大手笔支持我国的出版事业，本《文库》是无法面世的。在此，请允许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主编谨识

## 弁　　言

澳门史研究，余入其堂奥并不算早，1992年应为起步之年，至今，则整整廿载。“史海三十年，泰半在濠镜”，也就是说，余学术生涯的三分之二是在研究澳门历史，当然，也包括以澳门为中心的中国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闽粤东南亚海上史。本书内容主要来源于余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澳门初期开埠史研究》和1999年以后发表的明代澳门史研究论文，合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即“明代澳门史研究”。本书虽然是一部澳门历史研究的专题著作，但却囊括了明代澳门研究的方方面面，所涉有：明代葡萄牙人东来及澳门开埠、明代澳门政治（政策、管治、职官）、经济（贸易、饷税）、文化（华人、黑人、寺庙、教堂、火炮、夷船）、城市发展、中葡关系及澳门历史地理诸问题。书中既有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名、事件、文献及名物制度的微观考证，也有对明代澳门历史的整体把握和宏观论述，大中有小，以小见大，纵横交织，中西文献史料相互映证，呈现了一幅内容极为丰富且色彩斑斓的明代澳门史的全景像。

本书所收论文虽然多是十几年前的旧作，但这一次所作的补充与修订，工作量仍然很大，特别是增加了许多近年来新发现

的史料，使本书的论证更加充实与完善。还有就是，本书插配了 162 幅属于第一手资料的古代澳门图像及书籍影印件，很多图像及影印件均为学界第一次公布，极为珍贵，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的完成应该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无私提供资料的金国平、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黄一农、戚印平及李毓中教授；第二是感谢为余翻译各种西语文献资料及合作工作的学生赵殿红、张中鹏、田渝、陈玉芳博士及澳门大学葡萄牙语系的硕士研究生；第三，还要感谢为本书的录文、校对、编制目录、制图付出了辛勤劳动的陈玉芳、赵新良、牛祥冬等同学。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二编  
——当代学人边疆研究名著

编委会成员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厉 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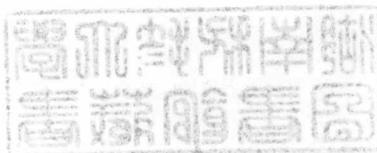
副 主 编: 丁一平 于逢春 李大龙

编委会成员: 丁一平 马大正 于逢春 王子今

王希隆 厉 声 吕一燃 李大龙

李治亭 李金明 李国强 邢玉林

林荣贵 周伟洲 魏存成



# 目 录

## 上 卷

第一章	中葡关系的起点——Tamão 新考	(1)
第二章	胡琏其人与西草湾之战	(37)
第三章	平托《游记》Liampo 纪事考实 ——兼谈《甓余杂集》中的佛郎机史料	(65)
第四章	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考	(111)
第五章	葡人驱盗入居澳门新说 ——以委黎多《报效始末疏》为中心	(143)
第六章	澳门诸名刍议	(163)
第七章	澳门开埠时间考	(195)
第八章	明朝野土人对澳门葡人的态度、策略及流变	(223)
第九章	明代在澳门设立的有关职官考证	(273)
第十章	明代管理澳门仿唐宋蕃坊制度辨	(311)
第十一章	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	(337)

## 下 卷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与澳门的“黑人”	(407)
第十三章	明代澳门地区华人居住地钩沉	(445)
第十四章	万历十四年蔡汝贤笔下的欧洲人形象及澳门资料 .....	(479)
第十五章	万历十九年汤显祖澳门之行	(509)
第十六章	万历中期广东税监李凤与澳门的关系 ——以朱吾弼《参粤珰勾夷疏》为中心	(537)
第十七章	万历末年熊明遇笔下的欧洲三国	(563)
第十八章	万历四十八年“红夷”船沉阳江始末考 ——兼谈红夷大炮早期入华问题	(607)
第十九章	明中后期中葡贸易中饷税问题考述	(641)
第二十章	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始末考	(669)
第二十一章	两广总督张镜心《云隐堂文录》 与崇祯末年的中英、中葡冲突	(693)
第二十二章	明季澳葡政权的走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723)
附录一	外国人名对译表	(755)
附录二	征引文献版本	(764)

## 第一章 中葡关系的起点——Tamao新考



此图系 1570 年葡萄牙人费尔南·瓦斯·多拉多绘制的《远东航海图》，其中标出了本文考证的中葡关系的起点——上川岛 (Samchoão)。



# 第一章 中葡关系的起点——Tamão 新考<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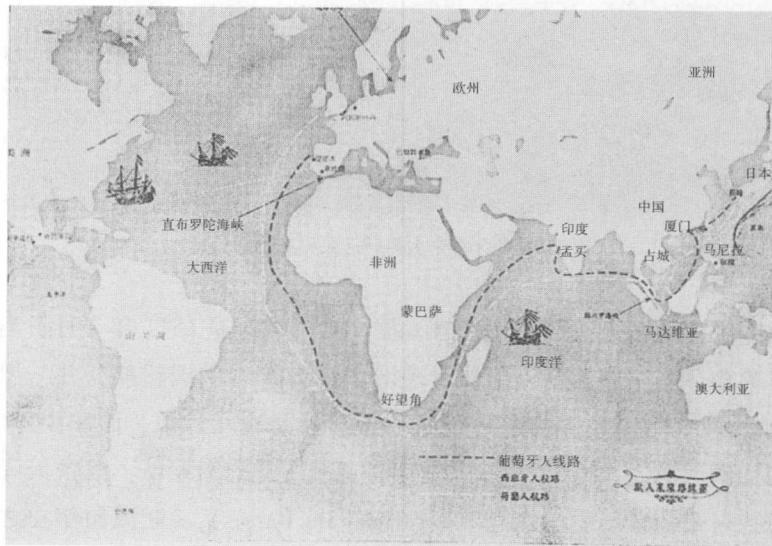


图1：葡萄牙人东来路线图

<sup>①</sup> 此文原载《学术研究》，19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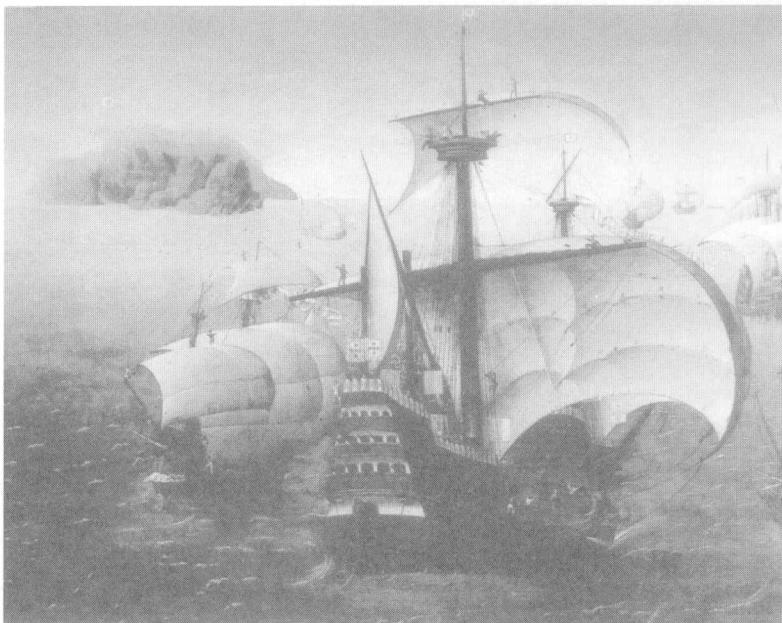


图2：葡萄牙东来大黑船（又称克拉克船）

中葡两国人民的首次接触，据文献记载应是1511年7月，当时葡萄牙舰队进泊马六甲，发现港内泊有5艘中国帆船，并与船上的中国人建立了友谊。<sup>①</sup>但这一次接触是在马六甲，而非中国。中葡两国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发生关系则是在1514年。据张天泽引著名葡萄牙历史学家巴罗斯（João De Barros）《亚洲旬年史之三》一书的资料记载：

有一位名叫欧维士（Jorge Álvares）的葡萄牙人比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lo）早一年来到屯门岛，也就是说，欧维士是在1514年抵达那里的。他在岛上竖起了一根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纪念石柱，其目的当然是要纪

<sup>①</sup> 张天泽著，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第2章，37页，香港，中华书局，1988。

念他对中国“发现”。他的一个儿子已死去，便葬在屯门岛。七年以后，他在又一次访问中国时病故，他本人也就葬在这根石柱下面。<sup>①</sup>

查巴罗斯书原文应是这样：

当时（1521年）他（欧维士，Jorge Álvares）病得很重。杜瓦尔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抵达后11天，他便离开了人间。他被埋葬在刻有葡萄牙王国徽记的石质发现碑下。这块碑正是欧维士在拉法尔·普雷斯特罗（Rafal Perestrello）抵达此地前一年在此竖立的。当年，他将过世的儿子埋在碑下。尽管那个异教的地区吞噬了他的躯体，但在这天涯海角，他为了祖国的荣誉竖起了一块发现纪念碑。<sup>②</sup>



图3：1514年来华的葡萄牙人欧维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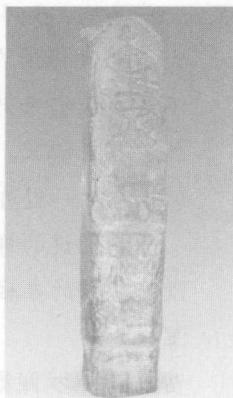


图4：雅加达北部葡萄牙发现纪念石柱

1516年，葡属马六甲总督第一次遣使中国，但这次出使失败。1517年，葡再次派使臣往中国成功。这是中葡关系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官方接触。巴罗斯在《亚洲旬年史之三》一书中记载：

<sup>①</sup> 张天泽著，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第2章，38页，香港，中华书局，1988。

<sup>②</sup> 若昂·德·巴罗斯：《亚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2章，见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15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